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唐宋八大家散文

广选·新注·集评

欧阳修

卷

前 言

欧阳修（1007—1072），字永叔，北宋吉水（今属江西）人。中年号“醉翁”，晚号“六一居士”，卒谥“文忠”。《宋史》卷319有传。

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、史学家，曾修《新五代史》，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，在文学的实践和创作理论上都有重大的建树。他又是一位政治家，北宋初年的庆历新政，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革新思想和勇气。但晚年却反对王安石的变法。他的一生，丰富多彩，既有辉煌，亦有很不得意的时期。他在中国的文学史、政治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。

欧阳修四岁丧父，他的母亲郑氏，誓守不嫁，带着他到随州（今湖北随县）投靠他的叔父欧阳晔。欧阳晔时为卑职小官，因之，他的生活处于贫困之中。但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欧阳修的母亲。这位伟大的母亲，一心想要儿子能在社会上出人头地。她亲持家务，同时担负起教导欧阳修的责任。家贫无力买纸笔，欧阳修的母亲就以荻枝在沙上写字，教会了欧阳修认字书写，留下了流传千古的“欧母画荻”的故事。由于母亲的教导，年少的欧阳修十分好学，经常到附近的藏书人家借书抄读，由于敏悟过人，一书尚未抄完，往往已能成诵。少年时期，欧阳修就靠这种勤学的努力，读了不少

书，学识大进。年少时，在随州城南大户李尧辅家，偶然发现了一部破旧的《昌黎先生集》，仅存六卷，阅读之后，他受到深刻的启发，于是苦心探索，视为珍宝。多年以后，他回忆当时的情景，说“读之，见其言深厚而雄博，……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”。（《记旧本韩文后》）这对他后来形成“文以载道”的文学思想，对他领导“古文运动”以及他自己的文学创作，都有很大的影响。

欧阳修为了应举入仕，他不得不学习骈四俪六的“时文”。于17岁宋仁宗天圣元年（1023），首次参加随州州试，在试卷中对《左传》中的神秘色彩加以批判，提出挑战。但因落官韵，遭到黜免。天圣八年（1030）举进士甲科，任西京推官（洛阳地方行政长官法律事务助理）。西京留守钱惟演是西昆派首领之一，喜文爱才。因此欧阳修在任期间，能与幕府的诗人梅圣俞和古文家尹洙相互倡导古文，结成深厚友谊。这是他从事政治生涯的开始，也是他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。

欧阳修一生经历丰富，成就甚多，概括地说，在政治革新方面，古文运动方面，文学创作方面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有《欧阳文忠公集》153卷，附录5卷；《六一诗》1卷；《六一诗话》1卷；《毛诗本义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、《集古录》、《洛阳牡丹记》、《归田录》等著作。

—

欧阳修的政治活动，可分为前后两期。

天圣八年（1030）他以礼部试第一，中进士甲科，为西京留守推官，这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开始。

我们知道，北宋王朝自初立朝，就有先天的不足，承五

代之弊，北有燕云十六州陷入契丹之手，不能收复；西有夏国李继迁的明臣属而实相扰；宋朝对外是失败的。对内，宋王朝纵容贵戚大臣，官僚数量极为庞大，还有大量的不拿俸禄的吏员，政府公开允许他们贪污敲诈；同时统治阶级生活腐化，一时成为风气。总的说，宋朝立国之初，对外苟安，对内因循。

这种情况到宋仁宗时更加严重。宋真宗时，宋辽交兵，赖寇准的努力，才在澶州与辽订立了“澶渊之盟”，以纳岁贡换取了北方的暂时平定。“澶渊之盟”其实是宋朝的屈辱之盟，暴露了北宋王朝的腐朽无能。仁宗时，河北边防继续不修，以纳贡为御敌之良策，以至在庆历二年（1042）不得不增贡岁纳。对西夏，亦是如此态度。景祐五年（1038），李元昊大举攻宋，宋军政不修，平时只知苟安，对将帅又多加箝制，接连败阵，庆历四年（1044），宋朝只好答应岁给西夏纳贡，以同样的屈辱办法换取了西北边境的苟安。

在对外完全失败的同时，宋王朝内政是以因循为施政方针。早在真宗朝，真宗问大臣，“治道应以何事为先？”宰相李沆，参知政事王旦分别回答说：“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，此最为先。”“祖宗之法俱在，务在行故事，慎所变改。”（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卷七）这成了真宗、仁宗两朝的施政方针。在这种方针指导下，内政不修是必然的。同时，由于对统治阶级的纵容姑息，宋王朝在真宗、仁宗时期，官员贪赃甚多，而生活极端腐化。有名的词人宋祁，晚上在府第中要点上几支蜡烛拥妓醉饮，连他的哥哥都有些看不过去（欧阳修《归田录》），而这却成了当时的美谈。

内政外交不修，生活腐化，无疑要加重人民的本来就相当沉重的负担，使得本来就相当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，

整个国家的局面很是不好。正如欧阳修在庆历二年（1042）《准诏言事上书》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，当时的情况极为糟糕，他说：“从来所患者夷狄，今夷狄叛矣；所恶者盗贼，今盗贼起矣；所忧者水旱，今水旱作矣；所赖者民力，今民力困矣；所需者财用，今财用乏矣。”这就是说，欧阳修踏进仕途，他所面对的整个朝廷是内忧外患并作，天灾人祸同起，王朝处于岌岌可危的局面。

面对这种状况，统治阶级中有清醒头脑、力图使王朝长治久安的一批改革者，酝酿并继而实行了政治改革。欧阳修入仕不久，就主动地投入了这个改革中去了，从此他的政治活动就呈现出了诱人色彩。

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欧阳修在汴京任馆阁校勘，此时吏部员外郎、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对因循守旧的宰相吕夷简不满，对他的任用非人，图谋私利很为愤慨，于是就上书仁宗，并进《百官图》，讥切时政。吕夷简大怒，仁宗于是就把范仲淹贬为饶州（今江西波阳）知州，尹洙、余靖上疏论救。时为左司谏的高若讷，却诋毁范的为人，欧阳修十分气愤，就给高若讷写了一封信，指责他附和宰相意旨，不顾公义。这一行动触怒了保守官僚，于是他被贬为夷陵令（今湖北宜昌）。这是欧阳修在政治活动中第一次被贬官。

夷陵僻远，当时条件很差，这无疑是对欧阳修的惩罚，是给他以颜色。但贬官夷陵并没有销尽他改革政治的愿望。他在夷陵的数年中，仍然关心朝政，并以诗文为工具，表达了他关心民生、关心国家、一心要振兴朝廷的理想。夷陵之后，欧阳修为乾德令、滑州通判，在外数年，庆历初，回到京师，他很快地就又投入了政治革新运动中去了。

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范仲淹被从陕西对西夏的防御前线

上调回京师，先为枢密副使，不久就为参知政事，他同门下侍郎、平章事杜衍、枢密副使富弼、韩琦等人一起，开始推行庆历新政。这是北宋王朝第一次政治改革，欧阳修热情地参与，并在舆论上作了有力的宣传，很快就在实际上成为了改革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。

新政的主要内容，就是范仲淹在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札子中所说的“明黜陟”、“抑侥幸”、“精贡举”、“择官长”、“均公田”、“原农桑”、“修武备”、“减徭役”、“覃恩信”、“重命令”十项。这十项实际地说，并不是什么特别的，它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把国家的事情按照已有的法度明确起来罢了，就中只有“均公田”、“减徭役”、“原农桑”涉及朝廷的根本大计，其余都是用人问题。总的精神，是要统治阶级从上到下振作起来，不要因循苟且而已。

但，正如一切的要求改变现状的行为一样，这个并不从根本上有什么特别要求的新政，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些人的极力反对。夏竦、王拱辰等一批人处心积虑，要把范仲淹等人排挤出朝。庆历四年（1044）秋，杜衍的女婿苏舜钦，一个热心新政的人，因在进奏院用卖废纸的钱聚会饮酒，不准李定参加，席间支持新政的王洙作了一首《傲歌》。李定大怒，将此事告给了御史中丞王拱辰，王就指使御史鱼周询上奏，谓苏舜钦贪赃、监守自盗，结果苏舜钦除籍，所有参与集会的十余人都被贬斥。王拱辰喜曰：“吾一举网尽矣。”这是一个导火索，也是保守势力反攻的一个信号。显然，保守势力的目标不在苏舜钦，而在苏的岳父杜衍和苏的举主范仲淹，因为杜支持范的条陈十事，认为应当施行，是新政的有力推行者；而范是举荐苏为集贤校理的人，庆历新政的领袖人物。果然，不久保守势力就大举攻击新政，庆历五年

(1045)，范仲淹、杜衍、韩琦、富弼相继补外，被从朝廷驱逐，新政也就此失败了。

中国的政治斗争有个特点，特别是保守势力攻击改革者和想干事的人的方法，很值得认真总结。他们很少或者说根本不说改革者的主张对与不对，不讨论现实的局面有什么弊端，是不是需要改革振作，而往往是有两条策略。一是说，祖宗旧法俱在，循行而已，不必有所兴作；二，他们只攻击提倡改革之人，说他们喜生事，说他们骄傲，说他们搞“朋党”。想改革的人总是少数，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，很多人只可与乐成，不可与虑始，这不是历史屡屡昭示的吗？

庆历年间的保守势力，就是以“朋党”之说攻击主张新政那些改革者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欧阳修没有沉默，他针对性极强地写了《朋党论》，上奏给仁宗。文中说明，朋党自古而有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有朋有党是正常的，问题的关键不在有朋党，而在于分清是什么样的朋党，是君子之党抑或是小人之党。这个见解是相当深刻的。但见解深刻不等于就能被采纳，《朋党论》并没有给新政带来实际的帮助，宋仁宗还是把杜、范、韩、富驱逐出朝。欧阳修不顾一切，立即上《论杜衍、范仲淹等罢政事状》，明确指出：“杜衍、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，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，而不闻有可罢之罪。自古小人谗害，其识不远，欲广为陷害良善则指为朋党，欲动摇大臣则诬以专权。盖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，则未为小人之利；欲尽去之，则善人少过，唯指为朋党，则可尽逐。自古大臣被主知，蒙信任，则难以他事动摇，唯有专权是上所恶，方可倾之。夫正士在朝，群邪所忌，谋臣不用，敌国之福也。窃为陛下惜之。”又说：“今四人一旦罢去，则群邪相贺于内，四夷相贺于外。”此疏奏语言痛切，

见解高卓，切中群小之要害，可惜宋仁宗惑于流言，未能听得进去。

欧阳修作为庆历新政的积极支持者，早就成为了保守势力的眼中钉，于是，就在杜、范等人被逐补外不久，他也被构陷。这次构陷牵涉到他的外甥女张氏，后虽经大理寺、御史台审清，欧阳修无事，但还是落龙图阁直学士，知滁州。这是欧阳修第二次被贬官。庆历新政失败了，欧阳修这次被贬以后，虽不忘民生，但政治改革的热情却大大地被冲淡了，在往后的十年间，他由滁州而扬州而颍州，又作过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）留守，直至至和元年（1054）才调回汴京。这段时间，他的思想有些变化，他为庆历新政夭折痛心，但他的热情大不如前，他在诗文中甚至很少提到那段经历，他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实行所谓宽政，企图与民休息。这期间，在他的诗文中，寄情山水，闲旷自放的作品倒是不少。显然，他企图以寄情山水抚平内心的创痛，他过早地步入了政治和思想上的暮年。

至和元年（1054）五月，欧阳修服除，奉诏还京，为翰林学士、史馆修撰，与宋祁等共修《新唐书》。嘉祐元年（1056）奉使契丹；次年，知礼部贡举。他利用这个机会，禁斥“时文”，有力地打击了浮靡文风，促进了古文运动的发展。不久，他为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，以后累官至枢密副使，参知政事。事情往往就是如此，壮年的欧阳修一心进取，期望建功立业，以实现人生的“三不朽”，但却屡遭打击，极不得意；到了他知天命的时候，他已不再有以往那种锐气和进取心了，却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职务，可惜此时他已对政治改革兴趣不大了。

熙宁年间，王安石任参知政事，受宋神宗之命实行变

法。这个变法实质上是庆历改革的继续和深化，可是欧阳修却对这次变法不感兴趣，与王安石不合，极力求退，乃出知亳州、青州、蔡州。在青州时，上书极言青苗法，不被采纳；在蔡州，乃颓放自娱，号为六一居士，为《六一居士传》，仿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自述生活情趣，谓惟读书、弹琴、弈棋、饮酒，可见他此时对政治的态度。熙宁四年（1071）以太子少师致仕，归颍州居住。次年（1072）逝世，年66岁。熙宁七年（1074）谥为“文忠”。

欧阳修由热衷政治、力求革新，到对政治兴趣不大、对更深刻的变法不以为然的转变，其中的消息颇值得人们寻味思索，他这一思想和行为历程，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士人的思想和生活经历。不过，此处不是细加讨论的地方，请读者自己去思考可也。

二

欧阳修是北宋中叶古文运动的主将，又是西昆体的改革者，为当时文坛上公认的领袖人物。欧阳修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有较大贡献，其主要有三：一是大力宣传提倡古文运动；二是培养人才队伍；三是崭新的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。

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，是唐代韩愈、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继承和发展，而且它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革新运动的一翼而出现的。赵匡胤统一中国后，使晚唐、五代以来的混乱局面，暂时得到安定，统治者为了粉饰太平，有意提倡诗赋，并在宫廷赏花钓鱼，君臣彼此唱和形成风气，于是浮靡文风得以发展，西昆体得以形成，而且越演越烈。当时西昆体的领袖是贵族、大官僚杨亿、刘筠和钱惟演，他们统治文坛三十多年。在天圣、明道年间，“天下学者杨刘之作，

号为时文，能者取科第，擅名声，以夸荣当世，未尝有道韩文者。”正当“刘杨风采，耸动天下”西昆体风靡一时的時候，却有柳开、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欧阳修诸人的古文，梅尧臣、苏舜钦诸人的诗，以其平淡质朴的语言，说理叙事，表现了真实的感情，一扫西昆体的官气味和浮艳气。

欧阳修领导的新古文运动，能得以迅速兴起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的。首先，继承了宋初以来诗文革新成果。北宋开国初，柳开、王禹偁对卑弱浮艳“五代体”的攻击；大中祥符以后，孙复、石介、穆修等人对华丽空疏“西昆体”的批判；其次，天圣七年（1029）、明道二年（1033）和庆历四年（1044）仁宗一再下达革除文弊、恢复古道的诏令，这些行政措施与当时文坛诗文革新主张完全一致，因而产生巨大社会影响，到欧阳修主盟文坛时，文风已有较大改观，正如欧阳修所说：“学者稍趋于古焉”（《苏氏文集序》），“其后风俗大变。今时之士大夫所为，彬彬有两汉之风矣”。（《与荆南乐秀才书》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，欧阳修等人提倡古文运动，革新西昆体，取得了成功。

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运动，是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，是作为政治革新运动一翼而出现的。当时一些知识分子，与他们改革政治主张相呼应，也要求进行文风的改革。如除了上述说的柳开、王禹偁等提出过革新诗文主张外，还有“庆历新政”的主要人物范仲淹在他的改革主张中，也包括对文风的改革。不过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显著成绩，使古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，则应首推欧阳修。苏东坡曾肯定韩愈“文起八代之衰”（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），又说“欧阳子，今之韩愈也。”（《居士集》序）将韩欧两人相提并论，可见欧阳修在宋代古文运动

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

引导欧阳修走上古文创作道路的是韩愈。欧阳修早在少年时代，就对当时的“缀风月，弄花草”的形式主义文风（西昆体）极为反对而十分推崇韩愈，热爱韩文，十岁时求得一部破旧的《昌黎先生文集》，视为珍宝，伴随终生。并将其作为从事古文运动的学习材料，韩文那种“深厚而雄博”、“浩然无涯”的文风，对欧阳修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。天圣元年（1023），17岁的欧阳修参加随州州试，试题为《左氏失之诬论》，其答卷中就写下了“右言于晋，神降于莘，内蛇斗而外蛇伤，新鬼大而故鬼小。”（《东轩笔录》卷十二）的警句，来概括《左传》中的神秘色彩，并对它加以批判，表现出一种勇于革新的时代精神。但由于落官韵被黜，复又重读韩文集，“喟然叹曰：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……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。”（《记旧本韩文后》）从此立下了尽早放弃骈文，精心致力于韩文的志愿。根据《记旧本韩文后》所说，欧阳修举进士后便与尹师鲁等人“相与作为古文，因出所藏《昌黎先生集》而补缀之，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订之。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，而韩文遂行于世”。欧阳修二十多岁就与尹洙等补缀校订韩愈文集加以刊行，于是韩文遂行于世。当时欧阳修联合尹洙、梅圣俞、苏舜钦等人努力写作其内容亲切、风格清新的作品，并大力宣传诗文革新的主张。后来，宋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他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科举考试，明确规定所有考生必用平淡朴素的古文来写文章，否则一律不入取。由此可见，欧阳修在当时起了主持一时风会的作用，而成为古文运动的盟主。他倡导古文，曾巩、王安石、三苏父子，都起来响应，从此在欧阳修的领导下，就掀起了宋代中叶的古文运动。经过多年努力，

宋代诗文革新运动，终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，呈现出宋代文学群星璀璨的鼎盛局面。

欧阳修在领导古文运动中，始终重视培养人才队伍。从天圣八年，他进士及第，次年三月到洛阳出任西京留守推官始，直至仁宗嘉祐年间，他凭借着自己在文坛和政界的声誉地位，大力奖励提拔新人，除了志同道合的梅尧臣、尹师鲁等团结在他的周围之外，其后还有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等古文大家都是他所推奖的。《宋史》本传说他：“奖引后进，如恐不及，赏识之下，率为闻人。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、洵子轼、辙，布衣屏处，未为人知，修而游其声誉，谓必显于世。”这就形成以欧阳修为盟主的人文集团，给予“西昆体”、“时文”以沉重的打击，这是取得古文运动胜利的有力保证，也是欧阳修于宋代古文运动中一大贡献。

欧阳修在领导宋代古文运动中，提出了新的文学创作理论，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起着突出的指导作用，这是宋代中叶古文运动所以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1. 在文道关系上，他主张文道并重，以道充文，先道后文；强调“切于事实”，反对言之无物的形式主义倾向。认为“道”是内容，是本质，“文”是形式，是明道的工具。把“道”比作金，把“文”比作金玉发出的光辉。欧阳修强调“道”对“文”的决定作用。他说：“我所谓文，必与道俱。”又指出：“圣人之文，虽不可及，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。”（《答吴充秀才书》）同时，又重视“文”，提出“言以载事，而文以饰言，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。”又说：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”（《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》）欧阳修肯定了“文”的独立价值，摆脱了唐代古文运动的片面性观点。2. 在文与现实的关系上，他要求作家“通下情”，走向

社会，接触现实生活，反映人民疾苦，反对“舍近取远，务高言而鲜事实”，为文而文，以至“终日不出于轩序”、“弃百事而不关于心”的“溺于文”的写作态度。（《答吴充秀才书》）强调必须“知古明道，而后履之以身，施之于事，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，以信后世。”（《与张秀才第二书》）表现出接近现实生活的倾向。欧阳修还继承了韩愈“不平则鸣”的观点，进而提出了“穷而后工”的观点，认为作家在对贫苦生活有了深切的体验后，才能取得较高的创作成就。3. 在继承与发展创新上，他提倡学习古人，但反对因袭模仿，主张推陈出新，认为“韩（愈）、孟（轲）文虽高，不必似之也，取其自然耳。”他的古文创作继承韩愈的“文从字顺”；扬弃西昆体浮华空洞、尚奇好险的倾向，提倡平易自然的创作风格。4. 他主张文体风格多样化，反对千篇一律，提倡作家要有个性特色，形成独立风格，自成一家。他说：“作文之体，初欲奔驰，久当收节，使简重严正，或时放肆以自舒，勾为一体，则尽善也。”又说：“古之学者非一家，其为道虽同，言语文章，未尝相似。”（《与乐秀才第一书》）特别提倡平易自然的风格，要求文章“其道易知而可法，其言易明而可行。”（《答张秀才第二书》）5. 提倡创作一流作品，由此扩大作品的影响。他自己就精益求精，遂以文章冠天下。

三

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，这是他对后世贡献最大，影响最深，被后人最为称誉的。他是我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。其中尤以散文为后人所传诵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吴充《欧阳公行状》称他：“文备众体，变化开合，因物命意，各极其工。”苏轼《居士集序》也说：

“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，论事似陆贽，记事似司马迁，诗赋似李白。此非予言也，天下之公言也。”其有价值的代表作品主要有以下几类：

1. 论。包括政论、史论及文论。政论主要论述政治见解，发表革新观点。如传诵一时的政论名作《原弊》剖析时局，揭露政弊，论说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根源。指出统治者不知“节用爱农”因而产生了“诱民、兼并、力役”等弊端，致使农民生活陷于困苦，所以主张轻赋税，除积弊，实行“宽简政治”；《本论》针对时弊，主张“治本”；《为君难论》上篇论国君用人之难，下篇论国君听言之难，其宗旨倡导言事之风。另一种内容就是坚持真理，有强烈战斗精神。如《朋党论》，与守旧派作坚决斗争，为改革新政提供了理论武器。更为人称誉的代表作《纵囚论》以李世民纵囚一事立论，主张立法治民应本于人情，认为那种“立异以为高，逆情以干誉”的做法不足为训。

欧阳修的史论也相当精彩，这种精彩表现在他对历史能给以深刻的认识，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，从而显现他高卓的见识。如《五代史·伶官传论》、《五代史·宦官传论》，都是颇发人深省的史论文。在史论散文中，欧阳修提出的基本见解，如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之说；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思想，前人或已说过，但是，欧公的史论文还是值得好好地读，还是有自己的特色。这就在于，欧阳修结合具体的事例，透彻地说明了道理，这些事情，叙述具体细致，很能让人了解具体情况。他的史论，每篇主旨不同，绝不空泛。以往的史书也有赞语之类的文字，除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以外，这样直接具体深刻的，确实不多，一般都就事论事，所说还未必深入肌理。正由于此，所以明

人艾南英说：“千古文章独一史迁，史迁而后千有余年，能存史迁之神者独一欧公。”（《再与周介生论文书》）

欧阳修的文论多为与友人或青年后学者的书信，其中有的谈为文之根本，标举主张，有许多是作者的经验之谈。《与荆南乐秀才书》、《与张秀才书》、《答孙正之第二书》、《答吴充秀才书》、《答祖择之书》等书信及以后的《苏氏文集序》、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、《答宋咸书》等等都是有代表性的文论之作。

2. 记。包括山水游记和亭园楼阁记。这类作品主要通过描绘山水景物，由此发议论，褒贬人生，感叹人生，寄托自己的理想和爱憎，抒发个人感慨，强烈表现着作者自我形象。如《丰乐亭记》记亭写景、歌颂太平气象，并告诫人们珍惜和平生活；《真州东园记》借助想象，描写东园的美好风光，称颂真州发运使许子春等能使“上下给足”，百姓“无辛苦愁怨之声”，然后“休其余闲”，其宗旨宣扬作者的宽政爱民思想。尤其历代名篇《醉翁亭记》，通篇都围绕“乐”字来构思，表面上是在描写自然山水，但实际上都隐含着再贬后官场失意的牢骚，纵情山水以示旷达的思想感情。《唐宋文醇》赞誉此篇为“欧阳绝作”。欧阳修另一类作品，抓住亭园楼阁的命名大做文章，抒发作者的思想情趣。如《非非堂记》、《相州昼锦堂记》、《画舫斋记》等，其中《非非堂记》，全篇以“非非”堂名，发表议论，阐述自己的是非观，表明自己“是是非非”、“宁讪无诤”的为人原则。

还有一种寓言小品式的作品，这类文章多为感时伤事而作。篇幅短小，具有哲理性、形象性、趣味性的特点。如《伐树记》以修治东园伐樗留杏写起，感悟事物的幸运与不幸取决于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，驳斥庄子“处于才不才之

间”的消极思想；《养鱼记》借用大鱼“不得其所”，小鱼“有若自足”的描写，讽刺人才难以进用的现实社会，表达作者怀才不遇的苦闷。有人说，最能显示欧阳修独特风格的作品，是序跋和景物记，这是有道理的。

3. 序跋。欧阳修以精于诗文集序著称。清人桐城派古文大师姚鼐在《古文辞类纂》序中，称赞欧阳修序跋为“序之最工者也”。欧阳修为别人诗文集所写的序跋为数不少，据统计有四百七十余篇。他一生中的政治观、经学观、史学观以及学术研究的心得体会等，往往从这类作品表现出来。如《梅圣俞诗集序》，从议论入手，论证诗人的创作成就往往是“穷而后工”，然后择要介绍梅圣俞的生平，重在叹其一生遭遇坎坷而不得志；《苏氏文集序》，高度赞扬亡友苏舜钦的文学才华与高尚人格，对苏氏一生不幸，深表惋惜，同时回顾诗文革新的历程及经验教训，颇具史料价值；《记旧本韩文后》，回忆自己多年来学习韩文，倡导古文运动的过程，总结自己学习古文的经验体会，是研究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和作者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；《集古录跋尾》，是作者考释金石铭文的学术成果，内容涉及史事、书法和文章艺术等，开创了我国古代金石学研究之先河。又如被清人刘大櫟誉为欧阳修文集序中的“第一”流作品的《释秘演诗集序》和称为“自有奇气”的《释惟伊文集序》两篇序文，更是历代传诵的名篇。

除了书序之外，欧阳修还有赠序类 16 篇。这类作品在欧文中也占一定分量。如《送曾巩秀才序》，通过曾巩考试落第准备回乡苦学的事实，赞扬他落第后“不非同进，不罪有司”，仍然“思广其学而坚其守”的志向，并指出当时科举考试的不合理，不能选拔真正的有用人才；《送徐无党南

归序》，用“三不朽”（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）之说劝勉徐氏，借此批判弃道求文的风气，表达作者文道并重的创作思想。

4. 辞赋类。欧赋基本上可分古赋和律赋两大类。在古赋中，有《红鹦鹉赋》、《病暑赋》、《述梦赋》、《螟蛉赋》等。欧阳修在赋体文学作品中，有的状物写景，有的抒情述志。如早期的《黄杨树子赋》，咏叹黄杨树“负劲节以谁赏，抱孤心而谁识？”赞美其“节既晚而愈茂，岁已寒而不易”的品格，作者借咏叹屹立江畔崖巅的黄杨树，曲折含蓄地表达了被贬后抑郁失意的苦闷和不畏重压的信念。他的散文赋更为后人传诵，其代表作《秋声赋》，文中感叹人生短暂，既有伤感又有知足保和、与世无争的情绪。在表现技巧上，此篇赋在欧的创作史上是具有独特性的新体赋，标志着汉赋经过骈赋的发展过程，已经向散文化过渡，从而为赋体的散文化树立了榜样。

5. 奏议类。其作品约400篇，这类作品可反映欧阳修从政生涯的轨迹，表现其革新时政的理论观点，反映庆历新政、嘉祐之治、熙宁变法的真情实况，很有史料价值。如《准语言事上书》等，能具体详尽地分析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形势，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，其风格颇似陆贽的作品。又如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》中，欧阳修列举事实，为杜、范等人辩解，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性，较前所写《朋党论》更进一步驳斥了朋比擅权之说。

另有诏册类约四百篇，颇具史料价值。

6. 碑志类。其作品约一百余篇。有价值的主要是那些哀悼友人的作品，其内容能真正做到不虚美，不溢恶。其中有不少能突出人物性格特点，叙事与抒情交融的佳作，如《黄梦升墓志铭》，文中两次描写醉舞歌呼的场面，不仅使人